

严学窘先生学术传略

刘 宝 俊

一

严学窘先生，字子君，现代著名语言学家、音韵学家。

1910年12月6日，先生生于江西分宜县介桥村。祖父雨山，曾任民初县传学所长，熟谙经史，饱学多才。父寅旭，曾为清末赣省优贡第一，当过民初省议员、安仁县令、省立第八中学校长，精文史，擅书法。先生于兄姊妹四人中排行第三，以天资聪颖为长辈珍爱。

介桥位袁水、介溪之滨，袁岭、昌山之侧。苍山叠翠，澄江如练，风景佳丽。严氏祖先于宋雍熙年间自福建邵武迁来分宜，卜居于此，后以介桥为中心蕃衍为当地望族。分宜名胜“万年桥”，即为先祖严嵩所建。昌山有一山洞，相传严嵩幼时曾于此避世苦读，后中明弘治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任内阁首辅10余年。遗风所化，明、清两代分宜文风盛极一时，介桥严氏总祠所悬“进士及第”牌匾累累不绝。先生在这人杰地灵的故乡度过了他的童年。

先生4岁，祖父即授以独特的启蒙教育。先教读《三国演义》，继之以《东周列国志》，而后《聊斋志异》，由浅入深，富有趣味。7岁入村小，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之类识字课本。学余由父课以书法，教学方法也打破传统描、摹、临、背的程序，先读帖，认识文字偏旁结构，然后跳过描、摹进入临，由此得书法之神而不拘于形。所习欧阳询体，先练寸楷，再练大、小楷。先生至老书法刚健遒劲，尤擅书欧体蝇头小楷，见者皆以为善。12岁，先生入其父长校的宜春江西省立第八中学，对国文一科特别感兴趣，对胡怀琛编《古文笔法百篇》尤其爱好，至老犹能朗朗吟诵。但受传统观念和家学影响，对数理化等不甚措意。认为学好国文才是“道”，数理化者不过“技”而已。

1926年秋，先生投考武昌中山大学。正待发榜之际，恰逢北伐军围城。入学未果，困于城中月余，饥馁几绝。后由红十字会出面，始得以难民身份逃离武昌。次年春接入学通知，又逢宁汉分立、汪蒋合流，武昌中山大学被迫解散。至28年秋三赴武昌，参加已改名为武汉大学的新编级考试，入预科二班。

在大学期间，先生先后师从朱东润、游国恩、刘永济、谭介甫、骆鸿凯、刘博平、吴其昌等著名学者，而尤受益于刘博平、吴其昌的语言文字之学。刘首授以张之洞《书目答问》，使知读书先从识字始；继授以藤花榭白文版《说文》，以“六书”理论详析文字形体结构，使他童年从父习字时所获汉字偏旁结构知识得以发展深化并产生浓厚兴趣，从而走上语言研究道路。吴则以容庚《金文编》为课本，要求摹写金文字形，使他对古文字有了初步认识。在刘、吴二师指导下，他撰写了《名原校补》、《广韵解题及其读法》等书稿。并撰《初文钩沉》八卷为毕业论文，“统计卜辞金文小篆所见到之初文，藉观原始字母逐渐孳乳之痕迹，与字音字义变迁之条理。”这些著作能融刘、吴二师不同学术观点于一体并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显示了他不限门户、转益多师、各取所长的学术风格。

二

1924年秋，先生大学毕业。经吴其昌介绍，北上拜见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欲投考燕京大学容庚的研究生，继续研治古文字学。然先生一介寒士，“长安米贵”，居且不易，没有能力购买昂贵的古文字学书籍。经唐兰指点，先生只好割爱，改考北京大学刘复教授的音韵学研究生。唐兰审查了《初文钩沉》，予以较高评价，由是先生取得了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资格。同年7月刘复病逝，刘的工作由罗常培（莘田）教授接任。先生从此立雪罗门，成为现代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教授的第一位拜门弟子。

对于现代音韵学，先生本很陌生。原在大学所学传统音韵学知识已陈旧过时，不敷应用，有的甚至成为接受新学的障碍。对此，罗师一面用北大文学教授罗庸的《治学态度及其方法》（1929年中山大学油印本）给他确立治学的基础，一面教以国际音标记录整理他的分宜方音。这两方面的教学，一扫传统语言学陈旧的治学方法，把他引向一条广阔、新鲜、充满活力的学术道路。在以后颠沛流离的漫长岁月里，他始终完好地珍藏着《治学态度及其方法》和《记分宜方音》两部书稿，作为永久的纪念。

1935年先生加入北京考古学社。同年6月在《考古社刊》发表第一篇论文《读中岛竦〈书契渊源〉后》，对日人中岛竦《书契渊源》和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打破传统“六书”观念、用新的方法理论研究古文字的精神深表赞赏，并提出研究古文字“不必执一二字以为新说，须先视是否在整个文字演变系统中相合”的考释方法，主张用精密的方法对汉字的构成和衍变作系统的解释并藉以建立科学的理论。该文体现了他对古文字研究的深刻见解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在京三年，经罗常培师的精心培养，先生的主要收获，首先

是学会了用现代语言学工具和语言学理论记录、归纳、分析汉语方言音系，写成《记分宜方音》书稿。该书为先生第一篇学年论文，后以《分宜方音述略》为题摘要发表。先生在该文序言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秋，余获从罗莘田（常培）先生治音韵学，猥荷悬摯指导，启诲良多，因草《记分宜方音》一书，以作审音之助。体例排比，多承师命。后以从事于音韵沿革之考证，此稿遂置篋中。不意七七变作，北平失守，余即只身逃出。罗先生稍后亦南下赴湘，竟于万分困难中携出此稿，后辗转至滇，复细为修订，邮寄于余。初意欲刊成册，奈适逢时艰，印刷非易，故今节缩成篇，非敢以言流传也”。由此可见罗师对该书稿的看重和所费心血。对赣语单一方言点的研究，迄今除罗先生所著《临川音系》外，即以《记分宜方音》最为深入全面。其次，学会了运用反切系联法研究中古音，写成《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刊于《国学季刊》6卷1期。该文为先生第二篇学年论文。据《胡适的日记》1937年1月9日记载：“第一次文科研究所文学部研究生报告。报告者三人：李棣，高庆赐，严学窘。”先生所报告的即《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听取报告的除胡适外，还有傅斯年、罗常培、唐兰、马裕藻、魏建功诸先生。先生的论文获得了较高评价。会后罗常培请上饭庄吃饭。席间胡适颇有兴趣地对先生说：“你是严分宜的后代，严嵩并不象史书上说的那样坏，这其中另有原因，你应该为他翻案。”但先生没有胡适替同乡戴震为《水经注》案打官司的时间和精力，终于辜负了胡先生的期望，然胡先生的话他却是至老未忘。第三，学会用丝贯绳牵法研究上古音，与丁声树、周殿福、吴晓铃一起参加罗先生组织的《两汉三国南北朝韵谱》一书初期资料收集、分析工作。因“七七”变作，工作未完，后由罗常培、周祖谟整理成《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一书出版。

除受罗先生的亲炙外，在北大自由活泼的学术空气里，先生还

先后师从罗庸、魏建功、沈兼士、唐兰、马衡等著名教授，接受语言学、文学和文化史多方面的知识。在这一时期，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李方桂、王力、丁声树等著名学者对他都有多次指教并具终身影响。经常在一起切磋学艺的，则有周祖谟（燕孙）、张为纲、罗季光、沈仲章、吴晓铃、周殿福、张清常等，均为一时俊彦，文彩风流。先生浸润于这种学术环境，艰苦自励，乐以忘忧，度过了三年清廉快乐的学习生活。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打破了古都学者平静的学术生活。北平沦陷前夕，先生泣别从学三年的恩师罗常培先生，在沈仲章帮助下，化装成商人逃出北平，到天津乘船，闯关海道，历尽苦辛，辗转而至江西宜春岳丈家中。

从1937年至1940年，先生曾一度失业。后至宜春师范学校和私立袁山中学任语文教师、校务主任，深得同事与同学之信任。然先生终不能释念于学术研究，系心于天荒地远的各地师友。在他1938年写给罗先生的一封信中，可见当时意绪：

莘师函丈：昨午接诵教谕，敬悉福躬安康，快慰奚如！承推荐请求庚款科学研究补助金，生于铭感之余，惟有克勤克慎，努力钻研，以冀图报于万一耳。生以钝铅之质，一割且难，乃屡蒙训诲，谬加赏拔，抚衷自问，深自滋惭。今又荷远赐南针，示生以治学得失之点，及应改进之处，自当遵行不渝，奋勉有加。生何德何能，而得逢恩师若此，殆天之降福于余欤？……生执鞭半载以来，以授课改文之事甚忙，至研究工作未能如常进行，至堪痛心！……现暑期虽届，以生颇能尽职之故，各校暑期补习班之国文亦须生担任。为人情及生活计，则又不能与不便推却，奈何！设请求庚款补助金如得以成功，则当毅然辞去也。赵（元任）先生想即将赴

美讲学。仲章兄已来信多日，据云为印木简事，在港尚有数月之勾留。燕孙六月中旬尚有信来，意在言外，阅之颇为抑郁。生甚愿其补助费早日成功，俾便南行，而得痛吐积怀也。近日战局深入内地，江西恐将沦为战区，此处位于赣西，而为湘赣要道，殆难免波及，届时或须流亡川滇，生命又无保障，言念及此，心惊胆寒。曾经沧桑，岂可得再！……

信中所言罗先生为申请庚款研究金事后未成。1940年秋经罗师介绍，先生到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文化学院文史系任讲师，授先秦哲学和国文。时中正大学由原南京高师“学衡”派三巨头之一的胡先骕长校，旧学空气颇浓。先生因传授胡适哲学思想及鼓吹白话文学，颇受文史系主任、国学家王易排挤。胡先骕（江西新建人）也多次约见他的江西小老表，希望他不要在中正大学鼓吹新学。不得已先生兼任江西省志语言志编纂，并与同窗好友张为纲一起在省教育厅支持下拟订了一项庞大的赣方言调研计划。1941年先生发表《泰和人学习国音法志要》和《纂修省志中方言略刍议》两文即此期部分成果。同时先生继续从事对汉语音韵史料作专史式整理的工作，整理小徐本《说文》反切音系和金唐诗韵谱，前者写成《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后者因时局动荡未克完成。此期先生进而属意于训诂学，欲打通音韵与训诂之关系。然苦于不得同道一吐蓄积之疑，多次函请于西南联大的罗师。因所提问题过多，竟招致罗先生发火，将他斥责一番。过后罗先生又写来一封长信。颇有文献价值，节录如下。

学窘：不是我不答你的信，实在是你所需要的太多，而我又太忙的缘故。你想，在北平的时候，我大大小小共有七个助手，心境是如何的舒适，生活是如何的安定。现在呢，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搜材料，起草，誊清，校对，教书，办公，应酬朋友，训导学生，跑警报，料理日常生活，甚至于洗衣服缝破绽，都得自己去做！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工夫给

你们这些渐渐可以独立研究的人去作高等助理员？在一块儿常见面，几分钟，几句话，也许指示你一条明路；写起信来就没那么简单，一来就得半天，请问在昆明现状之下，半天的闲暇，是多么难得？所以希望你原谅我以前，并希望以后再发问时，应该顾虑到我的时间。现在把几次信里可答的条答如下：一、在教厅所拟研究计划太大，我看只是小徐反切和全唐诗韵谱就够你作五年，要作就得快作，这两题张世禄都在着手了。二、赣人对于小学之贡献可参考谢启昆小学考，另外只好翻县志和本省已刊各家著述。三、上古音拟测表因非定论，故不愿寄出。两年来在联大并未印新讲义，多系口述由听者笔记。又前寄分宜音原稿（挂号）至张天成号，复信迄未提及，不知失落否？故感邮递颇不便。四、上年度我曾开训诂学，感觉《释例》并不重要，兹列其纲要如下。……五、读若、周礼汉读、声训均可考汉音，但须参用活用。六、语言志序例尚妥当。晤为纲时为道候，他也屡次有信来，我好久没给他写信了。七、我近似写一文名《民族迁徙与方言演变》登重庆文史杂志，大部分即以江西话作例，你们可注意看。八、马学良已不作广雅义例改作《路南保保语研究》，他和丁（声树）先生都在四川南溪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给丁先生写信不可太罗嗦，他也很忙。除马君外我新指导出来的学生可以通讯商讨的开列于下：（一）刘念和作史记汉书音切，住李庄史语所。（二）周法高作玄应音义的反切，住昆明新泉镇宝台山北大文科研究所。（三）傅懋勳（兹嘉）大理喜洲华中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西南语言，所作有蒙自保保语，成绩甚好。（四）陈三苏（女）贵阳花溪朝阳村亦庐，已成《台山音系》，现研究苗语。我流亡三年以来没写多少文章，可是这些位都是我的活成绩。好久没写这么长信了，你应该谢谢我！再者以后凡引用师说处都该声

明，这是治学的态度。……心恬 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在新泉镇宝台山北大文科研究所。

1942年日寇犯赣东，泰和危急。先生应聘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讲师。时中大师范学院驻乳源管埠，先生借居民家，与音乐演奏家马思聪为邻为善。生活穷困至以小儿捕鱼虾以补食用。1943年先生申请教育部部聘副教授职。先是，先生逃离北平时有关学历材料均未携出。此时由傅斯年出具证明，杨树达审查，得以晋职。由是与杨树达相识成忘年交。经先生介绍，杨树达曾两次赴中山大学讲学，常往先生家。杨嗜肥肉，每至飧以红烧肥肉，杨先生大快朵颐，欢洽无拘。杨所著书籍、文章及讲义，均赠先生阅读。从杨先生处，先生获益训诂学知识尤多。1945年后先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教授。此间他主要讲授文字、音韵、训诂、国音概要、读书指导等课程，协助商承祚指导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第一批研究生，与王力、钟敬文、黄际遇、詹安泰、岑麒祥等师友砥砺学术。在学术研究上主要注意于训诂学的研究，发表有《“转注”与“假借”为义训之本说》、《释汉儒音读用本字例》等论文，打破汉字形体限制，依音随义转之迹阐述词义，从汉字与汉语的矛盾中阐发词义、语音、语法变化的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先生从现实中深刻认识到社会的腐败，积极投身于当时的进步活动，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秘密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先生同其他教授一起，参加营救梅龚彬、钟敬文等进步教授的斗争，劝说知名教授留校，组织进步学生护校，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几经抄家、搜查，处境十分危险，只得于1949年5月只身逃往香港避难。

四

1949年10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先生学术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0月15日广州解放。消息传

到香港，先生立即返回广州，参加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1950年，先生参加广州南方大学为期一年的政治理论学习，从此，他结束了单一的书斋生活，走向广阔的社会去开辟新的学术领域。

1951年，先生参加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及岑麒祥、岑家梧、张为纲等一起到粤北和海南岛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访问。考察结束后回中山大学不久，他欣然接受中南军政委员会令，赴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研究室主任，从此开始了长期的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2年12月，先生调查了珠江流域的水上居民，即历史上被称为“疍家”的特殊民系。据传他们是元末蒙古军人的后裔。元亡后没有田地房产，只好寄生水上，以打鱼捕虾为业。先生在疍家的船上从民族学的角度进行了全面调查，认为他们没有根据成为单一民族。他将调查情况写成报告上交中央民委，为确定疍家的民族成分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2年在筹建湘西苗族自治区期间，先生担任中南民委湘西工作队队长，偶然从一位来自湘西的女青年田心桃那里发现了一种自称为“毕兹卡”（土家）人的语言。他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既非湘西苗语又非当地汉语的语言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在查阅了大量文献材料后，他单枪匹马前往土家人聚居的龙山县土坡村作实地调查。在一次途经一条悬崖半腰的山路时，欺生的湘西马突然将他颠下来。幸亏他眼急手快，一把抓住悬崖边上一蓬杂草，挣扎着爬上来，才幸免于难。经过艰苦的调查分析，先生确信土家语是一种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土家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他将这一发现向在湘西参加筹建苗族自治区的中央民委主任奎璧、中南民委主任张执一以及湘西行署党委书记周小舟等作了详细汇报。由于中央与地方领导意见未统一，问题搁置起来。不久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有关土家族的调查材料上交

中央民委。后经潘光旦先生复查，证明土家族确应成为单一民族。1956年国家正式承认土家族，并于1957年将原湘西苗族自治区改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53年先生调任中南民族学院研究室主任。次年任该院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从1953年9月到1954年5月，他率领由中南行政委员会民委和广西民委组成的调查组，分两阶段对广西境内尚未确定民族成分的民族进行调查识别工作。调查对象主要有龙胜伶、苗、黎人，罗城仫佬人，环江毛南人，三江六甲人，南丹隔沟人，平果陇人，防城京族，龙津傣人等。先生主持编审了9种调查报告，铅印作内部资料。其中毛南、仫佬、伶人、傣人、陇人、京族的情况调查于1987年列入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公开出版。

1954年7月，受中南民委委托，中南民族学院研究室人员汇同广东省党政机关干部33人，联合组成“中南海南工作组”，由先生任组长，从1954年8月至1955年1月，分两阶段对海南岛黎族中心“合亩制”地区及自治州内各县进行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宗教、人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综合调查，以确定海南岛黎、苗族社会性质。这次大型调查获取了丰富的资料，编印成《海南黎族情况调查》和《海南苗族情况调查》，共5册180余万字，铅印内部交流，为海南岛的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学术价值为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界公认。《海南黎族情况调查》于1991年经压缩、修订交出版社公开发行。

1956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委组织700多人，分成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赴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语言调查。先生受命担任第一工作队副队长兼海南分队队长，负责调查黎语方言土语分布情况、异同程度和各自特点，划分黎语方言土语，确定黎语基础方言和标准语音，制订黎文方案。先生亲自拟订了详细的语言调查提纲。令人惊异的是，后来

黎族方言的研究结果，与调查提纲里黎族支系的分划若合符节！经过6个多月的调查，工作队圆满完成了任务。调查材料整理成《黎语调查报告（初稿）》。在1957年2月举行的“黎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先生代表海南分队宣读了他与王均、欧阳觉亚合写的《关于划分黎族方言和创制黎文的意见》的学术论文，为这一调查研究作了总结。这次会议通过了黎文方案，并就黎族文字的诞生向毛泽东主席拍发了贺电。在调查中和结束后，先生撰写了《黎文创制的经过》、《黎语构词规律和创制新词术语的原则》、《从语言结合人文情况探索民族史例》等论文。这次成功的大型田野调查再一次显示了先生不畏艰苦的工作精神和他的组织能力、学术水平。

从1959年开始，先生积数年田野调查工作之所得，通过跟汉语系亲属语言的比较，开始进行汉语上古音韵的系统研究。是年，发表《汉语声调的产生和发展》，阐述汉语声调“从无到有，由少而多，由多而少，渐趋消失”的演变规律。1962年，他发表《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为上古汉语结构拟出丰富的复辅音声母。1963年，发表《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初探》，认为上古汉语元音分松紧，中古元音分长短，两者有历史联系。同年，又发表《试论汉藏语音变现象的类型》，归纳出汉语音位结构体系声母十大变化、韵母三大调整、声调三大分合的历史音变规律。四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对上古汉语音韵作了专题研究，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古音系统。

五

1970年，中南民族学院撤销，先生调任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1975年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负责字典审音工作。他主持制订了《审音条例》并主办审音学习班，亲自授课，培训大字典审音人员。围绕审音工作，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论文。《释疏

璃》一文根据“琉璃”一词历代以来的误读、误解、误认现象，借助张鸿钊《石雅》一书有关资料，在好友梅龚彬之子、地质学家梅建明帮助下进行科学分析，为字、词典训释名物名称提供了范例。《怎样注音、订音和正音》论述审音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步骤，提出用“十查”的办法确定每个汉字的正确读音，是一篇指导和总结字典审音工作的科学论文。《循义定音、循音统形——释字要则》强调在文字的形、音、义三者中要以音统摄形、义；在众多的又音中应分清训诂音和韵书音的区别，并以大徐《说文》反切作为标准音来统摄其他音。这一观点是对丁声树先生有关理论的进一步推阐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在后一文中特别推崇陈独秀先生的未刊书稿《小学识字教本》。此书为陈氏未竟之绝笔，陈死后仅油印数部以赠友人。当1946年先生从陈的安徽同乡、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处获此书油印稿时，如获至宝，手抄笔录，一字不漏，保存下来。先生受陈氏语言学思想、特别是陈氏有关古有复辅音的理论影响尤深。他认为陈独秀先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小学识字教本》“笔花吐艳，字字珠玑”，是循义定音、循音统形的典范，“是历史性和规范性的科学巨著”，“为清段、王之所未及，而又为后世之所不可无”之作。“文革”后先生曾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走呼号而未果。后闻台北语文研究中心已于1971年出版此书，赵友培题签，梁实秋作序，虽不著作者姓名和陈氏原序，然先生仍为此书能传之后世而深感欣慰。

1977年以后，先生的学术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1977年，他担任华中师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湖北省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文史组组长。次年获第一批汉语史研究生学位授予权并招生；同年12月他筹备、组织成立了湖北省语言学会，任理事长。在首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的论文，论述了区分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的严格标准。同年他还表了

《论汉语同族词内部曲折的变换模式》一文，为汉语词源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反映了四十年代初他与张为纲研究汉语新训诂学的部分成果。1980年7月，先生代表湖北省语言学会，协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武汉筹备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语言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大会于同年10月下旬在武昌召开，他当选为副会长和常务理事。会上他代表汉语史学科作了题为《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与继承》的报告，系统总结了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成就及其孕育现代语言学的过程。大会结束后仅三天，先生又组织中国音韵学界学者在同一地点召开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会议。会议推选他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首任会长，以后连任四届。会上他提交了《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的论文。这篇长达5万余字的论文反映了他数十年研究汉语上古音的总结性成果。

1980年，先生还受华中工学院委托为该院筹建语言学系。同年11月，该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宣告成立，他被聘为该所所长。1981年7月，先生为该所创办了大型学术刊物《语言研究》半年刊，任主编。其出刊之快、质量之高为国内外罕见，语言学界惊呼“天下文章之英尽归桐城”。同年底，该所招收4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先生受聘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导师。对于该所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资料图书，先生无不殚精竭虑，亲自擘划。他曾以古稀之年亲赴北京，历经周折，在吴晓铃先生帮助下，将北京大学魏建功先生遗书、数万册线装古籍尽数收购，用大卡车运回中国语言研究所。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特别是国内外罕见的朝汉对音资料，成为该所的宝贵财富。

1980年中南民族学院复办，先生续任该院副院长。次年底，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赴巴黎参加“促进以母语为教育工具”的专家会议，作了《中国民族大家庭内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作用和对第二语言的教学要求》的报告。这次巴黎之行为他开辟

了一个双语研究的新领域。在这一领域他撰写了大量论著。在第4次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为建立中国对比语言学而奋斗》，被与会者誉为“纲领性文件”。《中国的双语现象》在《中国语言学报》（美国）1986年1期刊载后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季刊》转载。《中国对比语言学浅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双语现象的理论专著，获得了国家民委1989年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1985年，先生应巴蜀书社约，为《中国文化要籍导读丛书》撰写了《广韵导读》一书，精当赅备地表现了他研究中古音的总结性成果，反映了当代《广韵》研究的新水平。先生对于此书颇为自许，曾言当年从罗常培先生求学时，罗先生希望他能写出两部高水平的著作：一部《广韵》研究，一部汉语音韵史。罗先生还亲自起草、修改提纲。现唯《广韵导读》一书可慰罗先生在天之灵，而汉语音韵史一书则有待于罗门再传弟子了。

1986年夏，先生应中山大学聘，参加该校人类学系第一位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随转道广西应聘为广西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旋赴珠海休假。因旅途劳顿，饮食不适，在珠海病倒。未愈返回武汉，又患前列腺炎住院开刀。接着又患结肠癌，连开两刀。此期先生在古稀之年连开三刀的情况下，忍受病痛折磨，以惊人的毅力，将一生的学术论文整理成《勾稽集》和《一勺集》交出版社出版。又撰写15万字的《汉学导读》和16万字的《中国文化史论纲》两部书稿。前者是先生四十年代讲授《读书指导》讲义的系统深化，以整理汉族学术文化体系为纲，以历代有影响的名家名著为纬，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后者一方面客观、全面、深刻反思汉族的上层文化（指占有优势政治、经济地位的统治阶级所创造和享受的文化）和下层文化（指被统治、被剥削的一般民众所创造、享有的文化），一方面探索如何使中国的人文文化与西方的科学文化融会贯通。这两部深具学术价值

的书稿，既融合了胡适、罗常培、罗庸等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的深刻见解，又包含了先生一生对中西文化的探索和理会。

1991年12月29日，先生病逝于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积享八十有二年。逝世前一月，先生还以“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席的身份给大会发去贺信，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恭祝大会取得成功。弥留之际，先生还关切地打听《胡适文集》是否已经出版，亟欲一阅。在他病榻边，放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几位年轻学者替严嵩翻案的著作《严嵩评传》，和好友钟敬文先生的《论中西文化》、陈原先生的《在词语的密林里》等著作。

综观先生一生，屯蹇之日多而宽舒之日少。早岁生活困顿，中年颠沛流离，晚年又遭“文革”和疾病折磨。然先生乐观处世，奋发有为，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撰写了三百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汉语音韵、训诂、文字、方言、辞书编纂、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诸领域，都有精深研究和杰出贡献。先生的学术研究，注重汉语与亲属语言的研究相结合，汉语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相结合，汉语文献材料与现代活的方言相结合。注重形音义的一贯研究。注重建构新的理论，运用新的方法，挖掘新的材料。治学从不满足现状，敢于打破禁区，勇于探索。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语言现象，将汉语置于汉藏语系的大系统中来观察、分析、研究，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结合点上形成鲜明的特色。先生一生忠诚坦荡，清贫节俭，宽和待人。谦虚好学，学风严谨。他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语言科学和民族工作奉献了毕生精力。

作者工作单位：中南民族学院汉语史教研室

（本文责任编辑：毛华轩）